

汉晋春秋通释



【清】汤

球

黄

奭

辑佚

柯美成

汇校通释

【晋】习凿齿

著



人

文

版

社

汉晋春秋通释



【清】汤

球

黄 奭

柯美成

汇校通释

【晋】刁凿齿

著

辑佚



人
民
出
版
社

选题策划:任 超 柯尊全
统 筹:于 青
责任编辑:王 萍 邵永忠 陈佳冉
封面设计:肖 辉 欢 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晋春秋通释/(晋)习凿齿 著;(清)汤 球,(清)黄 奭 辑佚;柯美成 汇校通释.
-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5.7
ISBN 978-7-01-014922-6

I. ①汉… II. ①习…②汤…③黄…④柯… III. ①中国历史-史籍研究-东汉
时代②中国历史-史籍研究-西晋时代 IV. ①K234.204②K237.1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1890 号

汉晋春秋通释

HANJIN CHUNQIU TONGSHI

(晋)习凿齿 著 (清)汤 球 黄 奭 辑佚 柯美成 汇校通释

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)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34

字数:556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4922-6 定价:85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前 言

一、习凿齿以及汉晋襄阳习氏

习凿齿，字彦威，襄阳人。东晋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其生卒年说法不一：一说约生于晋元帝建武元年（317），卒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（384）；一说约生于晋明帝太宁五年（325），约卒于太元十八年（393）；更有一说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（328），卒于晋安帝义熙九年（413），等等。本前言叙事暂取第一种说法。

襄阳为习氏郡望。据唐林宝撰《元和姓纂》卷十《二十六缙·习》：“《风俗通》云：习，国名也。汉习响为陈相。”下标郡望“襄阳”，并晋习凿齿著《汉晋春秋》云。南宋郑樵撰《通志二十略》，其《氏族略第二》将习氏归入“以国为氏·夏、商以前国”类，引据与《元和姓纂》略同。又《资治通鉴》卷七十二《魏纪四》元胡三省注：“《姓谱》：‘习，国名，后以为姓。’《风俗通》：‘汉有习响，为陈相。’”至清王仁俊辑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》，其《补编》录宋何承天撰《姓苑》曰：“襄阳有习氏，后汉有习响。”始言习响为后汉人。而民初臧励稣等编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著录习郁、习凿齿等历代习氏十一人，独不录习响其人。该书附录《姓氏考略》则云：“习，少习。本地名，析县东之武关，见《左传》杜注，是习氏以地为氏。望出襄阳。”究竟是以国为姓还是以地为氏，以国为姓国在何处，习响生当前汉抑或后汉及其籍里何处，而今皆已不可详考；有籍里、宦迹可考并泽被后人的习氏始祖，当推后汉初襄阳习郁。

习郁，字文通，习融之子。据习凿齿著《襄阳耆旧记》云：“习融，襄阳人。有德行，不仕。”（卷一《人物》）融子郁，汉光武帝时为侍中、黄门侍郎。“郁为侍中时，从光武幸黎丘，与帝同梦见苏岭山神。光武嘉之，拜大鸿胪，录其前后功，封襄阳侯。使立苏岭祠，刻二石鹿，夹神道，百姓谓之鹿门庙。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。”后习郁依范蠡养鱼法，在襄阳城南数里之岷山南麓造大鱼池，中筑一钓台。池边有高堤，皆种竹及长楸、芙蓉，菱芡覆水。郁将亡，敕其儿焕曰：“我葬必近鱼池。”焕为起冢于池之北，去池四十步。（卷三《山川》）后世因名其池为习家池，省称习池。而岷山、习池自古为贤达胜士赏心游宴之处。晋羊祜镇襄阳，“乐山水，每风景，必造岷山，置酒谈咏，终日不倦。……祜卒后，襄阳百姓于祜游憩之所建碑立庙，岁时飨祭焉。望其碑者，莫不流涕，杜预因名为堕泪碑。”羊、杜并美，“预好身后名，常言‘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’，乃刻石为二碑，记其勋绩，一沉万山之下，一沉岷山之下，曰：‘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！’”山季伦镇襄阳，“每出嬉游，多之池上，置酒辄醉，曰：‘此我高阳池也！’”（卷五《牧守》）习家池因又别名高阳池。而鹿门山与岷山隔汉江相望，为汉末名士庞德公及唐代诗人孟浩然、皮日休隐居之地。唐宋以降，岷山、鹿门山不知赚取文人骚客几多翰墨，一时名家巨擘如陈子昂、张九龄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元稹、皮日休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曾巩、三苏父子等皆赫然在列。而二山与习氏已结缘在先。

习家池则历经近二千年，至今风物依然。她背倚岷首，群峰环峙，俯临汉江，帆樯隐现。东望城郭，楼阁峥嵘；南眺鹿门，层峦叠嶂。池苑内，祠馆台榭，飞檐走角，竹林清幽，山泉流碧。阳春柳浪闻莺，炎夏荷风送香，金秋碧池印月，隆冬暖雪沃松。四时八节，皆有赏心悦目之境界。

自习郁以降，襄阳习氏“宗族富盛，世为乡豪”（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）。汉末，天下大乱，群雄兵争，诸习氏因缘际会，多有一时俊杰，名著简册。其中，又以追随刘备、诸葛亮征战，从龙入川，立功仕蜀者居多。据《襄阳耆旧记》卷一所载，习承业博学有才鉴，历仕蜀汉江阳、汶山太守，

都督龙鹤诸军事。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，加裨将军，孙权袭杀关羽，遣潘濬讨珍，濬欲面见喻降，珍谓曰：“我必为汉鬼，不为吴臣，不可逼也！”临难之际，仗剑自裁，刘备追赠之为邵陵太守。“习祯有风流，善谈论，名亚庞统，而在马良之右。”《三国志·蜀志·杨戏传》载《季汉辅臣赞》曰：“文祥名祯，襄阳人也。随先主入蜀，历任雒、郫令，广汉太守。子忠，官至尚书郎。”裴松之注引《襄阳记》曰：“忠子隆，为步兵校尉，掌校秘书。”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屯兵，为禁军首领“五校”之一，秩比二千石，表示其已职居朝廷枢机。《蜀志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曰：“亮初亡，所在各求为立庙，朝议以礼秩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。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，后主不从。步兵校尉习隆、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：‘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，甘棠为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铸金以存其像。自汉兴以来，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。况亮德范遐迩，勋盖季世，王室之不坏，实斯人是赖，而蒸尝止于私门，庙像阙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尽顺民心，则渎而无典，建之京师，又逼宗庙，此圣怀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于沔阳，使所亲属以时赐祭，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庙。断其私祀，以崇正礼。’于是始从之。”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得人心的大事。另有“习询、习竺，才气锋爽”，“习蔼有威仪，善谈论”，而皆不详其宦迹。而习珍之子温仕于吴，“识度广大，历长沙、武昌太守，选曹尚书，广州刺史。从容朝位三十年，不立名迹，不结权豪。”（《襄阳耆旧记》卷一《人物》）后为荆州大公平。入晋，仍居大中正之职。大约就在蜀汉政权时期，襄阳习氏这一汉世土著旧族，已悄然跻身于新兴士族阶层。

然而，习氏家族的这种属性转换在入晋后似乎停滞了，这或许与其家族成员主要仕于蜀汉，亡国臣民仕进之路必然受阻有关。根据现有史料，襄阳习氏在两晋时期并未成为像江南王、谢那样的高门士族，而仍是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“乡豪”。习凿齿即自言：“诸习氏，荆土豪族，有佳园池。”（《襄阳耆旧记》卷五《牧守》）西晋时，诸习氏见于史乘者除习温外

尚有一习嘏：“习嘏为临湘令、山简征南功曹。莅官举大纲而已，不拘文法。”（《襄阳耆旧记》卷二《人物》）一介县令、将军府功曹，与习承业、习隆等蜀汉时为显宦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东晋时，这种情况亦未见大的改观。这从凿齿本人曾受到的歧视可以说明。据《世说新语·忿狷篇》云：“王令诣谢公，值习凿齿已在坐，当与并榻。王徙倚不坐，公引之与对榻。去后，语胡儿曰：‘子敬实自清立，但人为尔，多矜咳，殊足损其自然。’”刘孝标注引刘谦之《晋纪》曰：“王献之性甚整峻，不交非类。”王令即王献之，字子敬，以曾为中书令，故人称王大令、王令。谢公谓谢安，胡儿谓安侄谢朗。今人余嘉锡笺疏曰：“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，而子敬不与之并榻，鄙其出身寒士，且有足疾耳。所谓‘不交非类’者如此。”（《世说新语笺疏·忿狷第三十一》）徐震堃则笺注曰：“晋人讲门第，士庶不同坐。谢安见献之不肯与习同榻，故以拘于习俗讥之。”（《世说新语校笺·忿狷第三十一》）话虽如此，这也恰好证明了襄阳习氏在南渡中原士族一些人眼里，仍属于“寒门”、“庶族”一类。

二、习凿齿的仕宦生涯及其晚年

而习凿齿无疑是一位冠代佼佼者，同时也是襄阳习氏在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。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云：“凿齿少有志气，博学洽闻，以文笔著称。荆州刺史桓温辟为从事，江夏相袁乔深器之，数称其才于温，转西曹主簿，亲遇隆密。”据《晋书·穆帝纪》及《桓温传》，穆帝永和元年（345）七月，都督江荆司雍益梁宁七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、征西将军庾翼卒。八月，以辅国将军、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、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（温本传记为“荆梁四州”）诸军事，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永和二年十一月，桓温帅征虏将军周抚、辅国将军谯王无忌、建武将军袁乔等伐蜀。次年三月，蜀平；四月，还军江陵。又据《晋书·袁瓌传附子乔传》，乔初拜佐著作郎。桓温为辅国将军，请为司马，不就，拜尚书郎。温镇京口，复引为司马，领广陵相。温移镇荆州，乔“迁安西谘议参军、

长沙相，不拜。寻督沔中诸戍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、建武将军、江夏相”。袁乔在桓温镇荆不久即为江夏相，其数称凿齿之才于温，可能就在此后至伐蜀之前。史载袁乔“博学有文才”，而凿齿亦“博学洽闻，以文笔著称”，惺惺相惜，乔数称凿齿之才，不必定要相处、相交的过程。温、乔新莅重任，温谋伐蜀，乔力赞其成，当用人之际，荐拔自属常事。我以为这样认识是合乎情理的。果如是，则凿齿由从事转西曹主簿，应在晋穆帝永和二年。民国学者刘如霖著《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》，将“习凿齿为桓温主簿”一条系于永和二年，佐证了这一推断是可以成立的。永和二年末三年春，戎马倥偬，四月平蜀军还，论功行赏，均非荐引之良机。永和四年八月，袁乔以平蜀功，进号龙骧将军，封湘西伯，旋即弃世，其数称凿齿之才在此稍前更加无疑。目前学界多倾向于认为凿齿生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即317年左右，如此则凿齿时年正当二十九、三十岁。

《世说新语》的记载印证了这一推断。其《文学第四》第80条曰：“习凿齿史才不常，宣武甚器之，未三十，便用为荆州治中。凿齿谢笺亦云：‘不遇明公，荆州老从事耳！’”刘孝标注引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曰：“凿齿少而博学，才情秀逸，温甚奇之。自州从事，岁中三转，至治中。”岁中三转，当指由从事而主簿，由主簿而治中。年末三十为治中，正合凿齿实际。

桓温对习凿齿的器识是真切可感的。凿齿本传云，温尝因事对人言：“徒三十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。”其对凿齿之赞赏溢于言表。唐杜佑撰《通典》，这句话乃至被引用作为对主簿一职的补充描述：“主簿一人，录门下众事，省署文书，汉制也。历代至隋皆有。晋习凿齿字彦威，为桓温荆州主簿，亲遇深密。时语曰：‘徒三十年看儒书，不如一诣习主簿。’”（《通典》卷三十二《职官十四·州郡上·总论州佐》）

但本传并未记载凿齿由主簿迁治中事，而是承上写道：“累迁别驾。”据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，司隶校尉有从事史十二人，假佐二十五人。外十二州，皆有从事史、假佐，员职略与司隶同。治中从事，主州选署及众事。别驾从事，校尉行部则奉引，录众事。簿曹从事，主财谷簿书。其有

军事，则置兵曹从事，主兵事。主簿录阁下事，省文书；门亭长主州正；门功曹书佐主选用。又有《孝经》师、《月令》师、律令师等员。三国、两晋基本承汉制，而有所增益。《晋书·职官志》：“州置刺史，别驾、治中从事、诸曹从事等员。又有主簿、门亭长、录事、记室书佐、诸曹佐、守从事、武猛从事等。凡吏四十一人，卒二十人。”关于别驾、治中之职，杜佑《通典》卷三十二《职官十四·州郡上·总论州佐》描述曰：“别驾从事史一人，从刺史行部，别乘一乘传车，故谓之别驾，汉制也。历代皆有。”又曰：“治中从事史一人，居中治事，主众曹文书，汉制也。历代皆有。”可知州之佐吏，从事史有十余人之众，而以治中、别驾最为贵显，其地位往往被认为高于郡守。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彭漾传》：漾为益州治中从事，“一朝处州人之上，形色器然”，旋以心大志广，难可保安，左迁江阳太守。又《杨洪传》：洪以领蜀郡太守转为益州治中从事，在诸葛亮东行永安问疾、成都单虚的情况下，启明太子，调兵遣将，一举讨平黄元之乱。可见治中位高任重。大体上说，治中、别驾，一主内，一主外，为州刺史之左右手，职位基本相当。或以别驾可“别乘一乘传车”，不同于其他幕僚，遂显得待遇高于治中。这或许也是本传不录凿齿曾任治中，而径书其“累迁别驾”的原因吧。

南朝宋何法盛则记录了习凿齿曾任治中、别驾二职。《世说新语·言语第二》第72条刘孝标注引其《晋中兴书》曰：“习凿齿字彦威，襄阳人。少以文称，善尺牍。桓温在荆州，辟为从事。历治中、别驾……”而《北堂书钞》卷七十三“设官部二十五·别驾”条引同一书曰：“习凿齿字彦威，为州治中，刺史桓温连征，凿齿或留，所在称职。”“习凿齿，刺史桓温甚器之，在州境十年。”据此可看出凿齿在荆州幕府的宦迹。荆幕十年，无疑是凿齿仕途通达、春风得意的十年。故唐贞观时官方重修《晋书》，《习凿齿传》基本上沿袭了《中兴书》的说法：“温出征伐，凿齿或从或守，所在任职，每处机要，莅事有绩，善尺牍论议，温甚器遇之。”而凿齿对桓温的器遇也是由衷感激、尽职尽责的。“不遇明公，荆州老从事耳”的表白以及“每处机要，莅事有绩”的描述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

然而十年后，因为两件事，使桓温改变了对习凿齿的看法，导致了二人的疏离和习凿齿的左迁、外放。

第一件事，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云：凿齿“后使至京师，简文亦雅重焉。既还，温问：‘相王何似？’答曰：‘生平所未见。’以此大忤温旨，左迁户曹参军。”简文、相王，皆谓司马昱。昱为晋元帝少子，永昌元年（322）封琅邪王，成帝时徙封会稽王；穆帝永和元年（345），太后临朝，进位抚军大将军、录尚书六条事，翌年受诏专总万机。司马昱乃明帝之弟、成帝康帝之叔、穆帝之叔祖，历仕元、明、成、康、穆五帝，可谓皇室代表人物，故其一旦秉政，有“相王”之称。而自此以后又历哀、废二帝，司马昱始终秉政，后桓温黜废帝，他被立为皇帝，是为简文帝，故《晋书》纪事又多称其为“简文”。东晋自元帝时起，朝廷（皇室）与方镇之间的矛盾便十分突出。东晋的边防，上游在荆襄，下游在淮南。手握荆襄、淮南重兵的方镇多有所为不轨，甚至公然举兵反抗朝廷。元、明二帝时曾先后发生王敦、苏峻之乱。成帝时，陶侃继镇荆楚，都督荆、江、雍、交、广等八州军事，领荆、江二州刺史，一世英杰，忠顺勤劳，史书犹指其“及都督八州，据上流，握强兵，潜有窥窬之志”，只是每思早年“折翼”之梦，才得“自抑而止”（《晋书·陶侃传》）。桓温继庾翼镇荆州，温雄武有才力，是东晋朝廷中不可多得的将领。唐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卷五记曰：“温在镇三十年，参佐习凿齿、袁宏、谢安、王坦之、孙盛、孟嘉、王珣、罗友、郗超、伏滔、谢奕、顾恺之、王子猷、谢玄、罗含、范汪、郝隆、车胤、韩康等，皆海内奇士，伏其为人。”如此幕府，诚可谓群贤毕至，英彦云集，亦可见桓温绝非等闲之辈。温西平成汉，北伐中原，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。然温乃乱世枭雄，一旦据上流，握强兵，其“觊觎非望”之心却难像陶侃那样“自抑而止”。而在皇室与强势方镇的博弈中，从习凿齿后来著《汉晋春秋》看，他是维护中央皇权，反对方镇觊觎非望的。据《晋书·简文帝纪》，司马昱自幼不仅“为元帝所爱”，而且受到著名道学术数大师郭璞的关注：“郭璞见而谓人曰：‘兴晋祚者，必此人也。’及长，清虚寡欲，尤善玄言。”康帝时曾下诏赞美司马昱：“会稽

王叔履尚清虚，志道无倦，优游上列，讽议朝肆。”当习凿齿出使至京师时，受到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非常人物的礼遇，“雅重焉”。因此，当桓温问及凿齿对相王的印象时，凿齿坦率地回答：“生平所未见。”（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）如此赞美之言，当然是桓温不乐闻的。温之不快可想而知，凿齿左迁也就在所难免。然户曹参军一职，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及《晋书·职官志》皆不载。考诸史籍，东晋元帝时，王敦为镇东（旋迁征南）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、江荆二州刺史，挚瞻曾为“大将军户曹参军”。桓温在平蜀后不久进位征西大将军、开府，此时荆州诸曹从事或改称参军，在情理之中。荆州参佐孙盛、顾恺之、王子猷等皆曾任参军之职。其后历南北朝、隋、唐至宋，设置参军之风日盛，名目繁多，不一而足。据《宋史·职官志七》：“户曹参军掌户籍赋税、仓库受纳。”唐白居易任翰林学士、左拾遗时，曾以家贫奉亲为名，乞为京兆府户曹参军，在得到皇帝恩准后，上《谢官状》并写下《初除户曹喜而言志》诗，表达感恩和喜悦之情，而其知交元稹更为他高兴得流泪，奉和道：“君求户曹掾，贵以禄奉亲。闻君得所请，感我欲沾巾。”可知户曹参军一职，不仅职位重要，而且是一美差。当时桓温征伐不断，户曹既掌户籍赋税，不仅要维持官署运转、民政民生，而且要负责部分兵员、军需供给，故户曹参军虽不如别驾贵显，但仍不失为重要僚属。《世说新语》记录了这样一件逸事：“习凿齿、孙兴公未相识，同在桓公座。桓语孙：‘可与习参军共语。’孙云：‘蠢尔荆蛮，敢与大邦为仇？’习曰：‘薄发狼狽，至于太原。’”（《世说新语·排调第二十五》）僚属于“主公”座前就对方籍贯互相调笑，起码从表面看，桓、习关系并未十分紧张。

但桓、习之间毕竟已有心结，这从桓温对第二件事的处理可以看出。《习凿齿传》云：“初，凿齿与其二舅罗崇、罗友俱为州从事。及迁别驾，以坐越舅右，屡经陈请。温后激怒既盛，乃超拔其二舅，相继为襄阳都督，出凿齿为荥阳太守。”因欲避免“坐越舅右”的尴尬而“屡经陈请”（本传未提及陈请内容，或为求升其二舅职位），致使桓温盛怒之下，超拔二罗而贬放凿齿。其实，二罗都是人才，罗崇后来任竟陵太守，晋废

帝太和二年（367）曾击破前燕将军慕容尘入寇；桓豁继其兄温任荆州刺史，罗崇又助其讨破南阳郡督护赵弘、赵忆叛乱。（见《晋书·废帝海西公纪、桓彝传附子豁传》）罗友后任襄阳太守，“累迁广、益二州刺史。在藩举其宏纲，不存小察，甚为吏民所安说。”（《世说新语·任诞第二十三》注引《晋阳秋》）可见凿齿之陈请，并非全为私心，尚有举贤不避亲之义。桓温以知人见称，从其后来重用二罗看，外放凿齿显然是小题大做。说到底，这还是第一件事的继续发酵：彼此间积久渐深的了解，政治上对中央皇权是维护还是“覬觐非望”的原则分歧，最终导致了桓、习的分道扬镳。

凿齿左迁外放，到底去了何处，中唐以前史籍基本上皆主“荜阳”说。上述《世说·言语》第72条刘孝标注引《晋中兴书》，省略的一句便是“迁荜阳太守”五个字。《中兴书》约作于南朝宋孝武帝时，距凿齿弃世未逾百年，该书被刘知幾称为东晋史书中之最佳者，其记东晋人和事自然最为可信。唐人重修《晋书》时，《中兴书》等十八家晋书尚存，故凿齿本传主荜阳说其来有自；而同期撰成的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于《汉晋春秋》及《习凿齿集》的著者皆载明为“晋荜阳太守”。一百多年后，唐肃宗时许嵩撰《建康实录》，其卷九《晋·烈宗孝武皇帝》亦记曰：太元九年，“冬十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……是月，前荜阳太守习凿齿卒。”直到又数十年后，唐宪宗时林宝撰《元和姓纂》，始出现“晋衡阳太守习凿齿著《汉晋春秋》五十四卷”一条记录。后世所见《世说》“出为衡阳郡”之讹，或即肇端于此。按《世说·文学第四》第80条云：凿齿“后至都见简文，返命，宣武问：‘见相王何如？’答云：‘一生不曾见此人。’从此忤旨，出为衡阳郡。”刘注引《续晋阳秋》亦曰：“后以许旨，左迁户曹参军、衡阳太守。”究竟是外放荜阳还是衡阳？我倾向以荜阳为是。清乾隆时，王太岳等撰《四库全书考证》卷四十七《经义考下（史部）》云：“习氏《汉晋阳秋》，檀道鸾曰：‘凿齿以忤旨，左迁户曹参军、荜阳太守。’刊本荜讹衡，盖沿《世说》之误，今据《晋书》改。”其实《世说》唐前古本不应有误：刘注既已在《言语篇》引《中兴书》称凿齿“迁荜阳太守”，不可能在其后的《文学篇》将荜误为衡，那孝标注乃父大作也太不

认真了!《晋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建康实录》的作者皆执荥阳说,说明中唐以前人们所看到的《世说》等典籍记录皆为“荥阳”。然书经三写,乌焉成马,《世说》在传抄过程中误荥为衡并不奇怪;林宝在仓促撰成《元和姓纂》时,或所见钞本已讹为衡阳,或即林宝本人不慎致讹,皆有可能。《四库提要》就批评《元和姓纂》,以为“宝以二十旬而成书,援引间有讹谬”,并认同“洪迈《容斋随笔》称《元和姓纂》诞妄最多,盖有由也”。故晚近罗振玉、岑仲勉校《姓纂》,皆主“荥阳”以校正之。(《元和姓纂》卷十《二十六缉·习》岑氏校记)

而值得一提的是,宋本《世说》犹主荥阳说;郑樵《通志》、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,亦皆称凿齿为荥阳太守。(《通志二十略·艺文略第三·史类·编年》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七“史部·传记类”)郑樵为宋代著名史学家、目录学家,陈振孙为著名藏书家、目录学家,他们于荥阳、衡阳的取舍,应当是十分慎重的。衡阳说谬种流传,实不足据。清代以降,虽有四库馆臣明确指出《世说》“刊本荥讹衡”,执衡阳说者仍不乏其人。如余嘉锡《世说笺疏·文学》第80条曰:“程炎震云:‘宋本衡作荥。《晋书·习凿齿传》亦作荥。与宋本同。然荥阳属司州,自穆帝末已陷没,至太元间始复。温时不得置守,亦别无侨郡,当作衡阳为是。’《晋书》本传作‘荥阳太守’,吴士鉴注云:‘《元和姓纂》十作衡阳。是时司州非晋所有,荥阳当是衡阳之误。’”程、吴皆为清末民初人,程云出处未悉,吴注出《晋书》,程、吴犯了同一个错误。前四川大学教授刘静夫在《习凿齿评传》一文中指出:“按程、吴都忽略了当时的一件大事,即桓温北伐曾一度收复洛阳。据清徐文范《东晋南北朝舆地表》载,永和十二年(356年)桓温收复洛阳,请迁都,不许;东晋乃置司州,辖三郡:河东、荥阳、陈留。兴宁元年(363),荥阳为前燕攻占,东晋控制荥阳约七八年的时间。因此,程、吴说当时司州非晋所有,不得置守,是不对的。而且,东晋设司州三郡时,也正是习在荆州满十年的时候,故习曾为荥阳太守应该无疑。”此说可谓凿凿有据。

综上所述,习凿齿迁荥阳太守,已无可置疑。而外放荥阳的具体时

间，当在永和十二年八月桓温收复洛阳以后。凿齿“在州境十年”，此时年在不惑，春秋鼎盛，他在荥阳太守任上究竟干了多久、做了些什么，《世说》、刘注及《晋书》本传但云其在郡著《汉晋春秋》，以裁正桓温“覬觐”之心，其它则略而未载。至于他何时离任，也无从详考，所能揣知的是，他至迟在兴宁元年荥阳又为前燕攻占之前离郡。

习凿齿又回到了故里襄阳，并从此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。据凿齿本传云：“后以脚疾，遂废于里巷。”从现存史料看，罢郡后罹患脚疾的习凿齿，总体上过着乡居闲适的优游生活，并在与朋友的交往等社会活动中展示着他的才情。梁元帝萧绎《金楼子》卷五《捷对篇》，记载了如下故事：

习凿齿诣释道安，值持钵趋堂，凿齿乃翔往众僧之斋也，众皆舍钵敛衽，唯道安食不辍，不之礼也。习甚患之，乃厉声曰：“四海习凿齿，故故来看尔。”道安应曰：“弥天释道安，无暇得相看。”习愈忿曰：“头有钵上色，钵无头上毛。”道安曰：“面有匙上色，匙无面上塼。”习又曰：“大鹏从南来，众鸟皆戢翼。何物冻老鸱，腩腩低头食。”道安曰：“微风入幽谷，安能动大材。猛虎当道食，不觉蚤蛇来。”于是习无以对。

据《弘明集》卷十二所载习凿齿《与释道安书》，道安来襄阳传经实由凿齿之邀，撇开萧绎禀性猜忌、以己度人的不当描述，二人之会，各展舌华，诙谐答对，应该是很愉快的，因而才成就了一段佳话。南朝梁释慧皎撰《高僧传·释道安传》就说：“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，笼罩当时。其先闻安高名，早已致书通好。及闻安至止，即往修造。既坐，称言：‘四海习凿齿。’安曰：‘弥天释道安。’时人以为名答。”“锋辩天逸，笼罩当时”以及“俊辩有高才”的赞语，恰切地道出了这一对俗僧朋友的潇洒才情。

然而，前秦对东晋的战争，扰乱了习凿齿的平静生活。凿齿本传又云：“及襄阳陷于苻坚，坚素闻其名，与道安俱舆而致焉。既见，与语，

大悦之，赐遗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与诸镇书：‘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；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。’俄以疾归襄阳。寻而襄邓反正，朝廷欲征凿齿，使典国史，会卒，不果。”襄阳陷于苻坚，在晋太元四年（379年）二月。《晋书·孝武帝纪》曰：“（太元）四年春正月辛酉，大赦，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。丙子，谒建平等七陵。二月戊午，苻坚使其子丕攻陷襄阳，执南中郎将朱序。”北魏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卷三七《前秦录五·苻坚中》，记苻坚舆致释氏及凿齿曰：“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，当有圣人入辅中国，得之者昌。坚曰：‘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，襄国有释道安，神清气足，方欲致之，以辅朕躬。’并遣求之。习凿齿以脚疾废于里巷，坚素闻其名，与道安俱舆而致焉。既见，与语，大悦之，赐遗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与诸镇书曰：‘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；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。’”《高僧传·释道安传》亦记云：“时苻坚素闻安名，每云襄阳有释道安，是神器，方欲致之以辅朕躬。后遣苻丕南取襄阳，安与朱序俱获于坚。坚谓仆射权翼曰：‘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，唯得一人半。’翼曰：‘谁耶？’坚曰：‘安公一人，习凿齿半人也。’”半人之说，总为凿齿残疾，诸多不便，不能做一全人用也。凿齿入长安后还有些什么活动，诸书阙载，度“俄以疾归襄阳”之意，可以认为他不久就又回了家乡。数年后，东晋乘淝水大败秦军之势收复襄阳，据《孝武帝纪》，太元九年（384）四月己卯，“使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，克之。”此即所谓“襄邓反正”。不久，东晋朝廷诏征习凿齿典修国史，然而未及成行，凿齿便去世了。《建康实录》亦记凿齿卒于太元九年冬十月，正当襄邓反正后不久，二书相参，信而有征。假定凿齿生年约在317年前后不致大误，则凿齿享年约六十七八岁。

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，即本前言开头所提及的习凿齿生卒年的第三种说法，出自今江西新余《梅田习氏族谱》。据该《族谱·世系总图》云：“凿齿字彦威，号半山。博学洽闻，著《汉晋春秋》五十四卷。为荥阳侯。生咸和三年岁戊子八月十三日午时。因秦王苻坚寇晋，屡以书征辟之，正直自处，不肯从召。遂携其妻、子隐寓于万载书堂山，而卜居梅田。歿义熙八年壬子，享寿八十有余。葬分宜枣木山梅仙洞下大金星海螺形亥山巳

向。”则凿齿晚年去了梅田，享年约八十四岁。但《族谱》刻印在清乾隆时，因持论与唐前典籍相抵牾，故颇有学者不予认同，而认同者考信的史料又仅上溯至明代，遂致争讼。鉴于唐初重修《晋书》主要是在臧荣绪《晋书》基础上增删，参与者多为文咏之士，竞为文藻，不求笃实，故新《晋书》历来为学者所诟病，或有误芟珍贵史料，亦属可能。而族谱作为文献之一种，与正史、方志素称历史三大支柱，其史料价值往往不可低估。鉴于历代典籍散佚严重，故我以为，尽信现存典籍，轻易否定《族谱》，似亦不可取。此事还需各方学者齐心协力，钩沉索隐，孜孜以求，力争拿出更多可凭信的考证成果。

三、《汉晋春秋》卓异的史学价值

纵观习凿齿的一生，没有叱咤风云、轰轰烈烈，但却是一个有才华、有胆识的率性读书人多彩的一生。关于习凿齿的才情，《中兴书》《世说》《晋书》本传等所记已如前述，余嘉锡《世说笺疏·忿狷篇》更称“习凿齿人才学问独出冠时”，应当说均非虚誉。由于体例、篇幅所限，前言对习氏学问、才情不拟展开论述，只简要介绍他的代表作《汉晋春秋》。

习凿齿的著作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及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主要有史学著作《汉晋春秋》《襄阳耆旧记》《逸民高士传》及《习凿齿集》四种。四书皆早已亡佚，其中《汉晋春秋》《襄阳耆旧记》有清人辑本和今人校补本行世，《习凿齿集》仅剩零散文字数篇（节），而《逸民高士传》已无从寻觅。

习凿齿的著作，以《汉晋春秋》影响最著，凿齿的才情与卓识在这部书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二》史部古史编年类著录：“《汉晋春秋》四十七卷，迄愍帝。晋荥阳太守习凿齿撰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上》及《新唐书·艺文志二》乙部史录编年类著录《汉晋春秋》，则皆称“五十四卷”。《晋书》记载与《唐志》同。其《习凿齿传》云：“是时（桓）温覬觐非望，凿齿在郡，著《汉晋春秋》以裁正之。起汉光武，终

于晋愍帝。于三国之时，蜀以宗室为正，魏虽受汉禅晋，尚为篡逆，至文帝平蜀，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。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，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。凡五十四卷。”鉴于《隋》、《晋》二书皆为唐初官修，《隋书》成于前，《晋书》撰于后，《建康实录》与《元和姓纂》又皆以“五十四卷”为说，而彼时《汉晋春秋》仍存，可见其为五十四卷无疑。《隋志》为撰稿者笔误，亦或后人传写致误，已不可知。《汉晋春秋》何时亡佚，有人揣测在唐末五代时，但并无有力证据；可以肯定的是，至迟在北宋中期，这本书已难见到。南宋周必大为萧常《续后汉书》作《序》，在谈到《汉晋春秋》时云：“然五十四卷徒见于唐《艺文志》、本朝《太平御览》之目，逮仁宗时修《崇文总目》，其书已逸，或谓世亦有之，而未之见也。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皆不录此书，可证周氏之说。而高似孙《史略》卷三“历代春秋”及卷五“《通鉴》参据书”目下，却开列有《汉晋春秋》，或依《通鉴》引有此书若干条目而言，但也不能排除其另有所闻。

那么《汉晋春秋》为何而作，是否确如《晋书》所言？据《世说·文学篇》载，习凿齿因至都见简文，返命答问忤旨，“出为衡阳郡，性理遂错。于病中犹作《汉晋春秋》，品评卓逸。”刘孝标注引谭道鸾《续晋阳秋》曰：“凿齿……后以忤旨，左迁户曹参军、衡阳太守。在郡著《汉晋春秋》，斥温觊觎之心也。”凿齿本传基本上沿袭了谭道鸾的说法。然而，唐时刘知幾对此说已不以为然。《史通·探赜篇》云：“习凿齿之撰《汉晋春秋》，以魏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耳。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罔失德，《豪士》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《女史》由其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尔而就也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藉以权济物议，取诫当时？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《王命》，一何异乎！求之人情，理不当尔。”知幾以为，裁正桓温觊觎之心，“取诫当时”，一篇赋箴足以当之，何须“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”！